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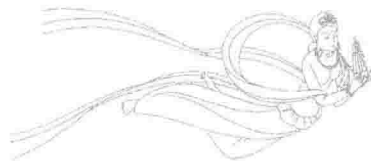
敦煌所出唐宋书牘 整理与研究

DUNHUANG SUOCHU TANGSONG SHUDU
ZHENGLI YU YANJIU



王使臻 王使璋 王惠月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出土唐五代公文整理研究”
(编号: 13XZS005) 资助出版



敦煌所出唐宋书牒 整理与研究

DUNHUANG SUOCHU TANGSONG SHUDU
ZHENGLI YU YANJIU

王使臻 王使璋 王惠月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所出唐宋书牋整理与研究 / 王使臻, 王使璋,
王惠月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43-4998-1

I. ①敦… II. ①王… ②王… ③王… III. ①书信—
文化研究—敦煌—唐宋时期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686 号

敦煌所出唐宋书牋整理与研究

王使臻 王使璋 王惠月 著

责任编辑 张慧敏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 品 尺 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24.5
字 数 612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998-1
定 价 9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言

书牍，古人又称“尺牍”。尺牍一词，首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缙紫通尺牍。”^①指齐太仓长淳于意之女缙紫上书汉文帝，请求替父赎减刑罚。在《史记》的语境里，“尺牍”即上奏文书。但在汉代，尺牍是人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不仅包括公文，也包含私人之间彼此通信的书札。另外，“尺牍”的命名与书写载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秦汉时期的主要书写载体是简牍，从出土实物来看，将官私文书书写在当时大约一尺长度（约23 cm）的竹简木牍之上，已经非常普遍而成熟^②。这些文书记录，从书写材料的载体与形制特征上命名为尺牍，泛指书于竹简木牍等书写材料之上用于往来通讯、传递信息的公私文书。可见，“尺牍”的定义是从书写材料的形制而得名，其含义很广，自上告下的公文、自下启上的奏疏、平辈相语的书札皆可称为书牍。两汉之际，当书写材料从竹木布帛演变到纸以后，简牍时期的一些书写制度沿袭了下来，用于往来通讯的文书仍然被书写在当时一尺左右的纸张之上，“尺牍”之名，并不因书写载体的变化而废弃。魏晋南北朝时期，“尺牍”的含义扩大了，也指与书牍密切相关的文辞、文体、书法，产生了“书疏、书翰、书牍、笔札、刀笔、尺书”等与书牍同义的诸多名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官曹文书，世间尺牍”^③语，将“文书”与“尺牍”对举，用“文书”指公文，而以“尺牍”指代私人书札。但从当时文献中记录的“尺牍”概念来看，它泛指包括公私书疏在内的一切应用文体，不偏指私人书札。唐宋时期，“尺牍”的基本含义仍然是公私文书。自宋以后，“尺牍”一词沿袭至近代，词义有缩小，专称私人书札为书牍。

书牍中最早出现的是公牍（公文），秦汉时期以公文为代表的书牍制度发展成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两汉以后，书牍的体裁、格调、制度皆有源流可辨，基本奠定了后代王朝的公文制度，此后一千多年，公文的格式、称谓、用印等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汉文书制度的轨迹发展演变^④。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牍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专门的书牍之学。东汉蔡邕的《独断》和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汉代以来至南北朝的各类公私书牍进行总结，对书牍诸文体的产生、形成和演变与各时期政治、军事、文化学术、社会风尚对书牍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行清晰而扼要的阐述，试图从社会变革中观察书牍的沿革、变化与得失，探究书牍与现实政治之间互相贯通、互相影响的关系。民国时期，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对先秦至清代数千年以来公牍的发展演变做了梳理，以历代书牍内容、格调及文风的主要倾向及书牍的格式为考察对象，系统研究公牍的发展、变迁的历史原因。此后，书牍、档案史的研究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零五《扁鹊仓公列传》“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17页。

②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牍，既有郡守的公文文书，也有士卒的私人家书。参：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有精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书前增附竹简原大的图版，可见二者的区别。

③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六《书证第十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6页。

④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序二（李均明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究就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20世纪初,随着汉晋简牍的相继出土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对古代书牍制度、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方才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唐宋传世文献中虽然摘引了许多书牍的内容,但很少能够完整保留当时公私书牍的原始形制,记载也颇多简略,且较多集中于上层社会,很少涉及中下层社会。以上种种限制了对唐宋书牍所反映的制度文化与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唐宋时期的书牍还处在书写载体发生变化的时期,书牍的书写载体尽管发生着缓慢的演变^①,但书写载体上承载的制度文明总是偏向于传统,稳定性较强,也有变异性。因此,借鉴汉晋简牍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从书写载体变化的历史宏观视野,探讨书牍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制度的继承性,以及唐宋书牍的变异性和独特性,将出土简牍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结合起来,综合研究中国古代书牍制度的继承和变迁,考察唐宋时期书牍各文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进而以文本内容探究唐宋时期的历史细节,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资料,有五万件之多。内容极其丰富,除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和经、史、子、集各类汉文传统典籍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政府公文和档案、民间书牍等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这些书牍资料,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制度,是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所出唐宋书牍对于认识唐宋时代基层区域内人们以书牍作为信息的传递工具、书牍所反映的地方行政的处理程序和权力运作状况,均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敦煌书牍文献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其中保存的来自中原内地的书牍,对于研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地方区域内的文化教育水平等,都是丰富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牍中往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是研究区域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的极好材料。敦煌书牍比传世唐宋书牍文献具有巨大优势,即资料的原始性与丰富性。因此,对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研究,无论对研究晚唐五代宋代的政治制度史、地方史,还是研究书写载体从简牍发展到纸质写本之后,书牍文化传统的承袭与嬗变、古代信息传递制度的继承与变化,均有文化学、文献学以及档案学上的意义。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受到简牍学、文书学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及前辈学者对敦煌文献里的表状笈启类书仪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简牍学研究简牍形制等制度,文书学则研究文本自身特征,敦煌书牍既受简牍制度的影响深远,又具有写本时代的文本特征,在敦煌书牍研究中运用简牍学、文书学、文体分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敦煌书牍,将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比如,简牍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是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本原状态,提出了复原简牍的几个原则: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②。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中总结,随着简牍在一定时空内的移送与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③。内藤湖南将“公牍”类文献、公文书纳入文书学范围,研究公文书如

① 海外学人钱存训以英文出版了两部著作:《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他着眼于从书写载体的变化出发,探讨中国典籍和典籍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他认为:“中古时期,旧的书写材料(简帛)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纸)所淘汰,而是逐渐被取代。在纸发明之后,竹木仍继续通行三个世纪,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500余年。”参: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四次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② 参:[日]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谢桂华:《百年来简帛发展历程及其检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何在朝廷内和行政部门之间来回传阅的过程^①。池田温^②、藤枝晃^③也注重以文书学方法研究敦煌文献的文本特征,提示文献外形与内容之间的关联。以上简牍学、文书学、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体渊源、发展、形制以及复原、传递等具体问题,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具体言之,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本形态

敦煌书牍属于写本,必然有不同的文本形态,如草稿、定本、原件、副本、抄件等。20世纪80年代初,左景权在《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中提出以文书写本形态将敦煌文献分成三类^④,提出借助于原件或摄影去研究敦煌文书的形态,如判断文书的原件、草稿、副本等,研究文书的功用。左景权的分类方法未包括抄件在内,其实,抄件也是敦煌写本的文本形态之一,而且在敦煌文献中要占大多数。除抄件外,一些实际传递过的书牍被重新利用的情况也应该被重视。20世纪90年代,林聪明提出了从敦煌文书的出处去判断其文本形态和基本性质^⑤,注意到了敦煌书牍的地域来源与时空传递关系。林聪明认为,唯有就敦煌文书的题记、印信与内容考探之,最易正确辨明其出处。1991年林著《敦煌文书学》的出版,标志着林聪明比较系统的以文书学研究敦煌文书的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立。但仅凭题记、官印去判定敦煌写本的出处和文本形态,难免有其局限,更应结合其他书写特征、符号等综合去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敦煌所出唐宋书牍的文体

书牍诞生之时,就与一定的对象(发件人和收件人)发生关系,有文体问题。文体,是指文章的语言方式和文本的结构形式,是文本的体式特征,因为使用场合、使用对象的不同,在语言形式与语言风格上表现不同^⑥。由于血缘关系上的亲疏、社会关系上的尊卑,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人群以书牍传递信息时,在文本程式、用语方面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文体。敦煌所出唐宋书牍诸文体,与长时段历史时期里文体发展演变^⑦有密切关系,目前常见的文体有表、上书、奏、牒、状、牒、帖、启、书、委曲等十种文体。除以上所列十种文体之外,还有笺、令、教、榜子、记事、简札等书牍文体^⑧。

① 参:[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② 参:[日]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本书被列为《讲座敦煌》第五卷。综论和分论了敦煌汉文写本的内容。书中对儒家典籍、书仪、官文书、寺院文书和契约诸章,论证全面而且深入。唯在所论敦煌汉文写本文献中只缺少诸子典籍、私文书中的信札、社邑文书等方面的内容。

③ 藤枝晃提出从敦煌写本的用纸、笔迹等外部特征探讨敦煌文献的真伪鉴别工作。

④ 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 林聪明:《敦煌文书出处略考》,载《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973页。

⑥ 赵逵夫:《先秦文体分类与古代文章分类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⑦ 文体学研究证明,文体的命名,往往从书写的载体材料和书写的动作、行为特征出发,二者并行,使同一文体往往有数种异名的现象。因书写载体而得名文体,不会因为旧的书写载体的淘汰而废止,在新的书写载体时代仍然沿用旧名。书牍文体的命名,往往经过了从动词演化为文体专用名词的历史过程。书牍文体的演化,呈现出功能逐步明朗、单一的演化规律,往往存在从通用文体到专用文体发展定型过程。

⑧ 在敦煌书仪中,书牍文体涵盖广得多,如P.3449+P.3864《刺史书仪》中列有七十八种书牍文体。由于在敦煌所出唐宋实用书牍中一些文体未曾见到,本书主要讨论除制、敕等所谓“王言之制”之外的十几类常用书牍文体,一些不知如何命名的书牍文体,则收入在“简札”类中,见下篇“分类整理”。

敦煌书牒文体既有从简牍时代沿袭而来的渊源,也有在唐宋时期新的发展与变异。敦煌所出唐宋书牒诸文体,既有沿袭自前代的文体,也有适应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文体。在讲究身份地位、尊卑等级差异的中国古代社会,书牒对象的差异性不但决定着书牒的写法、措辞和格式的不同,甚至还决定着书牒文体名称的差异及其运行方向^①。“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②,书牒文体的不同,反映的是尊贵差序的社会等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与书牒发文者、接受者之间的相对身份地位有关。由此,书牒诸文体产生之初便与维系政治权力秩序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礼”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书牒中的公牒为政治服务,反映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书牒文体往往也随之变化。

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敦煌书牒的文体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从敦煌书牒文体的渊源、发展演变着手,对敦煌书牒的文体、敦煌书牒的押署与封缄及敦煌书牒文体与文书行政、信息传递等的关系进行综合的、深入的研究;试图从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角度,对敦煌书牒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唐宋时期的应用特点进行纵向的研究;将敦煌书牒文体发展与唐宋政治制度、文化史联系起来,以书牒文体、程式、在社会生活应用的演变去探讨书牒和政治、文化制度的关系,分析敦煌书牒所反映的唐宋社会文化现象。

敦煌文献中的公私书牒虽然是原始资料,但十分杂乱且很多是残缺的片断。尽管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一些校录本,但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公布,仍然需要对敦煌文献中为数众多的、零散的公私书牒进行重新分类与进一步整理。敦煌书牒中保留原貌的文本形态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敦煌书牒是抄本、复件等文本形态,而且往往残缺不全,或被割裂、分开,不能反映出书牒的原始文本形制特征,需要结合出土材料及敦煌书牒原始特征,对书牒的文体特征、形制特征进行辨析、缀合与复原。同时,敦煌书牒在传递信息时反映的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是复杂的、不明晰的。故要确知发件人、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必须结合敦煌书牒的文体特征、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其他敦煌文献的旁证等综合因素去推断。对敦煌书牒所反映的政治事件、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及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研究,对敦煌书牒所蕴含的时代政治、军事、文化等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度解析,还原历史细节与真实,见微知著地探讨唐宋时期的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难点。

① 书牒诸文体,以应用对象的不同,按文本的运行方向分成三类:上行、平行、下行。

② [南朝梁]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书记第二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6页。



上编 敦煌所出唐宋书牒研究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敦煌所出唐宋书牒研究概述 /002

第一节 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002

第二节 对公文书的研究 /007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008

第二章 敦煌书牒的文体研究 /011

第一节 敦煌所出表、上书、奏文研究 /011

第二节 敦煌所出“致书”的比较研究 /021

第三节 敦煌所出“别纸” /027

第四节 敦煌所出简札、谕 /037

第三章 敦煌书牒的押署和封缄研究 /049

第一节 敦煌书牒上的押署 /049

第二节 敦煌所出唐宋书牒封缄方法的复原 /056

第四章 敦煌书牒与唐宋社会历史研究 /070

第一节 敦煌归义军与唐中央的信息沟通 /070

第二节 唐宋之际的书牒与行政运作研究：以墨敕为例 /083

第三节 从敦煌书牒看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文化教育 /096

第四节 敦煌书牒反映的唐宋社会生活 /106

下编 敦煌所出唐宋书牒分类整理

整理说明 /116

目 录 /118

一、敕 /131

二、表 /134

三、奏状 /136

四、上书 /138

五、牒 /140

六、榜 /192

七、帖 /198

八、状 /209

九、启 /258

十、书 /269

十一、委曲 /277

十二、谕 /282

十三、简札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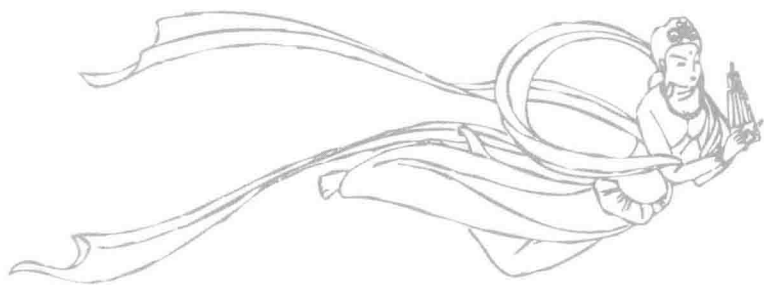
敦煌所出唐宋书牒相关人名索引 /286

参考文献 /375

后 记 /383

上编

敦煌所出唐宋书牋研究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敦煌所出唐宋书牋研究概述

在中国古代，书牋，又称尺牋，是人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工具之一。无论是国家政务的处理，还是私人之间的通讯，都离不开书牋这一信息的载体。“尺牋”一词源自汉代，是对于书写于简牋之上的通讯文字的泛称，它包括官文书与私文书。“尺牋”沿袭到唐宋时期，泛指公文和私人书牋。

敦煌文献中非佛经类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典籍类，二是实用类文献。实用类文献之中包含许多书牋，分散在书仪类、官文书和私文书札中。因此，本文将对自197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节 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一、中国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敦煌书仪是唐五代宋人书牋的应用文范本。“书”，是指书牋或尺牋，“仪”指礼仪规范。因此，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书牋类文献被归入到“书仪”类文献里，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书仪类文献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书牋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中的书仪类文献首先进行分类、校录与整理，有的还进行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开始进行敦煌文献中书仪类文献的研究，是“海内外系统研究敦煌写本书仪的第一人”^①。“他以卓越的识见，看到书仪是敦煌卷子中自来整理较少的一组文献，因而勇敢地向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开拓。”^②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③，“对于书仪的源流、唐代书仪的分类、敦煌写本书仪的类型、书仪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书仪对日本的影响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填补了敦煌学的一项空白”^④。

在周先生的开拓之下，赵和平、吴丽娱继后进行研究，分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赵和平从1984年起在周一良的指导下进行敦煌本书仪的整理与研究，十几年来，将一百多

① 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②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以上5篇论文又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件敦煌本书仪整理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①《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②及个案性研究专著《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③及数十篇论文^④。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1994年之前，赵和平发表的论文以对书仪的基础性研究为主，至1993年出版《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的《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一文，赵和平对于书仪的基本问题做了阐述，如书仪的分类、书仪中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料价值、书仪的作用、书仪反映的中原文化及书仪向周边民族的传播等，成为作者研究书仪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从1994年后，赵和平发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一文后，开始对敦煌书仪中一类实际使用过的书牍考订其历史事实，进行个案性的考证研究^⑤，至1998年出版《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是第二阶段。1998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赵和平发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⑥，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书仪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敦煌本书仪的定义、范围做了新的界定，尤其是指出“表状笺启类书仪”是广义书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它的特征是：主要是唐宋官僚社会中曾经使用过的往来书牍。1998年之后，赵和平主要以“表状笺启书仪”中的敦煌本《甘棠集》进行个案性研究^⑦。“作者以数年之功，字斟句酌，终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校本，还在查考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在校注中勾稽出了书中各件表、状之撰写年月及收件人的履历或所涉及的事件，为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既为人们读懂这些表、状提供了相关信息，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⑧

姜伯勤首开书仪与礼制的讨论。^⑨但系统地从礼仪发展演变的角度展开对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的是吴丽娱，她拓展了书仪研究的新领域——“开启唐礼研究的新途径”^⑩。吴丽娱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开始于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1999年，吴丽娱发

①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②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整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④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武则天时代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P.4050与S.5613敦煌写本综合研究》，《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1993年第1期。《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年第4期。《〈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1994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岛学刊》敦煌学专号（三），1995年。《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0+P.3864的初步研究》。以上13篇论文被收入在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乐学书局1997年版。

⑥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版。

⑦ 赵和平：《〈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

⑧ 郝春文：《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 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收入在姜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序言（王永兴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表《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①为其对敦煌书仪与礼仪制度研究的开端。之后陆续发表有《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②《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③《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④《关于 S. 078V 和 S. 1725V 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⑤《敦煌 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⑥《再论复书与别纸》^⑦《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⑧《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⑨。吴丽娱在对近二十年来敦煌书仪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书仪反映的礼制核心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官僚化的倾向为特征的中古社会的礼仪文明做了清晰而全面的研究,结成《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一书。此书是在赵和平对敦煌书仪研究的基础上的又一学术力作,尤其是对表状笺启书仪的研究上有新的成果,如对表状笺启书仪的渊源与公文书的发展关系、表状笺启书仪的分类与特色、书牘制作程序与反映的官场礼仪的变迁、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与观点足以启发后学,如唐代表状笺启书仪对汉晋以来形成的书牘之学(尤其是官文书)的继承关系、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从中央到地方的繁荣发展。吴丽娱又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⑩,负责“书仪章”的撰写工作。在《唐礼摭遗》的基础上,“书仪章”中既对《唐礼摭遗》中的内容有提炼,又有所补充。除了书仪与礼制的“宏观”研究之外,吴丽娱也利用敦煌书仪文献进行历史史实考证的“微观”研究,如对《书仪镜》中的“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注意到它是“杜氏《书仪镜》中很特别的一部分内容”,“它所收载的书信,并不仅仅是一些格式套语,而是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名地名”于是对此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了考证^⑪。从2001年起,吴丽娱以研究表状笺启书仪为主,与合作者杨宝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晚唐五代宋初有关敦煌归义军史实的考证类论文^⑫。

①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对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吴丽娱:《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吴丽娱:《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文史》第56辑,2001年。

⑤ 吴丽娱:《关于 S.078V 和 S.1725V 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吴丽娱:《敦煌 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

⑦ 吴丽娱:《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第13期,2002年。

⑧ 吴丽娱:《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⑨ 吴丽娱:《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⑩ 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⑪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对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⑫ 吴丽娱:《敦煌 P.2539V 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民族史研究》第2辑,2001年;吴丽娱:《再析 P.2945 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吴丽娱、杨宝玉:《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P.3016V〈△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杨宝玉、吴丽娱:《P.2992V 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4期。杨宝玉、吴丽娱:《P.2945 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2008年。

除了以上周一良、赵和平、吴丽娱对书仪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之外,在对敦煌书仪的研究之初,更多的学者是对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事件与信息的“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实际使用过的某一件或某几件公私书牒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或对其进行录文校释,或对其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考证。对 S.1438V 书仪,姜伯勤^①、史苇湘^②、杨铭^③、陆离^④都曾考证过沙州陷蕃时期的相关历史事实。对敦煌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唐五代“表”文,唐长孺^⑤、许福谦、郝春文^⑥、郭峰^⑦、郑炳林^⑧、冯培红、张军胜^⑨;李正宇^⑩等进行了相关史实与社会历史环境的研究。利用书牒研究敦煌归义军相关历史的论文最多。李正宇^⑪、赵和平、吴丽娱、郭峰^⑫、邓文宽^⑬、孙修身^⑭、苏哲^⑮、赵贞^⑯利用“状”“牒”类书牒文献对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之间的关系、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来往均做过考证。李军^⑰运用公私书牒文献研究了晚唐时期中央对凉州的经营与管理。系统地运用书牒材料研究归义军历史的是荣新江,在其《归义军史研究》^⑱一书及《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中对与沙州归义军相关的书牒史料,搜罗无遗,以揭示史实、判定年代。利用书牒研究河西民族史尤其是甘州回鹘史,如唐长孺^⑲、

- ①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 ② 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 1438 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
- ③ 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 S.1438V〈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 ④ 陆离:《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 ⑤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⑥ 许福谦、郝春文:《斯四四七三号写卷〈大晋皇帝祭文〉、〈大行皇帝谥状〉校注及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⑦ 郭峰:《〈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 ⑧ 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
- ⑨ 冯培红、张军胜:《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兰州学刊》,2009年第4期。
- ⑩ 李正宇:《〈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閼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2008年。
- ⑪ 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文献》,1988年第3期。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数据》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正宇《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年。
- ⑫ 郭峰:《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 ⑬ 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 ⑭ 孙修身:《敦煌文书伯 3016 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 ⑮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书状文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⑯ 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年;赵贞:《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 ⑰ 李军:《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李军:《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 ⑱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 ⑲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陆庆夫^①、邓文宽^②等。

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学者也对书仪的文学特征及书牋文体进行了研究。周绍良、颜廷亮编《敦煌文学》^③中,对书仪的文学性进行探讨,以表、疏、书、启、状、牒、帖等书牋文体分类对敦煌文学进行解说。张锡厚在1992年对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性进行了研究。^④对敦煌书仪中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是王启涛^⑤、张小艳^⑥。王启涛对敦煌文献中的法制书仪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张小艳的博士论文着重讨论书仪的口头用语及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陈静^⑦对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文献中一类较特殊的书牋文体——“别纸”进行了文体研究,从“别纸”的源流演变上考察了别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认为“别纸”在唐五代时期是人们书信来往时的复书中对第二纸书信的称谓。杜琪^⑧也主要是从书仪分类及书仪的文体上立论。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⑨将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牋集进行了比较研究。

台湾学者高明士、王三庆、谢海平、甘怀真、黄亮文都对敦煌书仪进行过研究。黄亮文还有学位论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究》,同时发表一些论文探讨敦煌书仪中的版本系统关系^⑩,是台湾学者对敦煌书仪研究的新的动向。

二、海外学者对敦煌书仪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⑪,起始于内藤湖南。1928年,内藤发表了关于敦煌书仪研究的一篇论文。之后,那波利贞、川口久雄、山田英雄等开始从事书仪研究。那波利贞注重研究以书仪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所忽略的各种世俗文书”,视其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珍贵资料。川口久雄所提出的对敦煌书仪的七类分类法,对于书仪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如在七分法中,川口注意到第四类“实际书信文集”与书仪已经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仪),开始尝试敦煌书仪的细分类研究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至今,日本的敦煌书仪研究自有其特点:在日本,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以一件写本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较少,更多的是结合别的专题进行综合研究,书仪并不

① 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陆庆夫:《唐宋之际的凉州嗟末》,《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③ 周绍良、颜廷亮:《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鄜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⑤ 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巴蜀书社2003年版。

⑥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小艳:《敦煌写本书仪的文体特色及其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⑦ 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⑧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科纵横》,2002年第6期;杜琪:《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⑨ 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万叶集〉书状的比较》,《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

⑩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黄亮文:《P.3681、P.4002、Dx.1055、P.4042、P.4024五件书仪写卷的缀合与探讨》,《敦煌学研究》,2007年第1期。黄亮文:《〈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附论其他书仪写卷的缀补》,《敦煌学》第27辑,2008年。

⑪ 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论文集》,2009年。

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日本书仪研究最多的是敦煌遗书与正仓院文书的相互比较研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一面。在芳贺纪雄的研究中,将书牒也归入书仪中,分正仓院所藏的书仪为三类:十二月仪、吉凶书仪、各种场合实用的书仪,第三类如《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即中国的《杜友晋书仪》。池田温等都注意到了敦煌本书仪的价值,从不同角度对敦煌本书仪加以研究。日本学者丸山裕美子更是在日本书仪与敦煌本书仪的对比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研究工作。广濑宪雄的研究视角较宽,从书仪与外交文书的礼仪格式上,进行比较研究收信、发信两国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当时东亚的国际秩序^①,他的研究思路,对于敦煌书仪的研究新方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对公文书的研究

利用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公文书去研究唐代制度史,日本学者走在前列,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以日本学者中村裕一的论著最具代表性。中村先后出版了唐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三本著作:《唐代制敕研究》^②《唐代官文书研究》^③《唐代公文书研究》^④,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文书的具体形态及复原上,主要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刻史料,并用传世文献佐证,复原并考释唐代制敕类文书(《唐代制敕研究》),但也涉及令书、教、露布、告身、牒、状、行状、度牒、公验(《唐代官文书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中国学者以吴宗国、祝总斌、刘后滨^⑤、李锦绣^⑥、李全德、邓小南、冯培红为代表,主要是利用唐代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官文书,主要是中央的制、敕牒类公文书,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从秦汉到唐宋时期中央行政体系的政务运行方式上,去探讨唐宋职官制度实际的运行情况。

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公文书按其文体格式可分为牒、帖、公验、榜文等,它们是政务信息的载体。

(1) 对牒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⑦,这是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学者最早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官文书之一的“牒”文的行政程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但主要是对唐代前期的牒文及其处理程序作了探讨,对吐蕃、归义军时期的牒式及其处理程序没有涉及;对寺院、民间牒文,限于体例,也不涉及。卢向前、王冀青^⑧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驿传的牒文书研究唐代的交通通讯。程喜

① 广濑宪雄:《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历史评论》,2007年。

② 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版。

③ 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版。

⑤ 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后滨:《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礼记之一》,《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⑧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霖^①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牒类公文书对唐代的过所、公验类的申请程序、勘验过程进行了研究。

(2) 对“状”类公文书的研究主要有：吴丽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课题——“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课题中的一部分，于2008年发表《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②，开始研究公牒中的“状”与中央行政体系里信息沟通的功能。利用公文书中的进奏院状研究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及唐代信息传播的管道，一度是研究热点。张国刚^③、吴震^④、郑炳林、徐晓丽^⑤皆有论述。新闻工作者也对敦煌的进奏院状感兴趣，认为进奏院状是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但历史学者们普遍认同进奏院状是公文书而非报纸。但敦煌书牒文献中仅有三件进奏院状，由于资料太少，目前的研究者已将注意力转向考证进奏院在唐代长安城内各坊的位置及进奏院状传递信息的具体功能上。

(3) 日本学者阪尻彰宏对敦煌文献中的“榜”文书作过研究，发表有《敦煌榜文书考》^⑥，研究敦煌归义军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文书行政。赤木崇敏^⑦对敦煌书牒文献中的封皮纸进行了复原研究，还以1990年发现的BD11181文书为材料，探讨了与归义军政权征税相关的文书行政，研究其征收的具体过程。

(4) 敦煌公文书中还有一类涉及法律争讼的牒、状等属于民事法律规范方面的文书，由刘俊文^⑧、王震亚、赵荧^⑨、唐耕耦^⑩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尤其是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分十四类辑录了敦煌汉文法律文书和相关文献，内容包括了一部分牒状、军事文书等，尤其是第十四类中收录了表、书、启、牒、状、帖等文书。

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中外学者对敦煌书牒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经过中国二三代学者的努力，学者们敦煌书仪类文献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推进了，目前转向对“表状笺启类书仪”的深入研究。“表状笺启类书仪”最初是周一良为书仪分类时，从书仪的广义概念（书牒的范文）出发，将之归入书仪的，但周一良也注意到其特殊性，即“某些写本看似书仪范文，而实际却很可能是正式表启发出后留以存档的副本”^⑪。赵和平也认为“表状

①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

③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张国刚：《敦煌唐代进奏院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吴震：《P.3547〈沙州归义军上都进奏院上本使状〉试析——试论张淮深何以屡请赐旌节而不获》，《1990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郑炳林、徐晓丽：《读〈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几件非佛经文献札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⑥ 阪尻彰宏：《敦煌榜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年。

⑦ 赤木崇敏：《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P.2555piece1の检讨を通じて》，《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3年第20期。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绿洲地区的税草征发与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丛》史学类，2007年。

⑧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⑨ 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 唐耕耦：《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⑪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